

Series of International Study



国际问题论丛

# 文化外交 一种传播学的解读

*Cultural Diplomacy*  
An Interpretative Mode of Communication

李智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文化外交

## 一种传播学的解读

*Cultural Diplomacy*  
An Interpretative Mode of Communication

李智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李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1

(国际问题论丛)

ISBN 7-301-08622-9

I.文… II.李… III.文化-外交-研究 IV.D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4919 号

**书 名:** 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

**著作责任者:** 李 智 著

**责任编辑:** 张盈盈

**标准书号:** ISBN 7-301-08622-9/D·108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邮箱: [pl@pup.pku.edu.cn](mailto:pl@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7785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6.25 印张 18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4.00 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作者简介

李智,男,1972年1月16日生,湖南湘乡人,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入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03年,入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哲学、国际政治与文化、国际传播与外交。主要的学术成果有:《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思潮》(新华出版社,2003年)、《论海德格尔的现代性批判——另一种后现代主义》(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合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另发表《文化外交在国际威望树立中的作用》(《学术探索》2004年第10期)、《美国的文化外交:软权力的运用》(《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文化全球化的双重性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年第5期)、《试论文化外交》(《外交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析“时中”在孔子生存境域中的魅力》(《孔子研究》2003年第5期)与《论信息化生存的两重性及其出路》(《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12期)等论文十余篇。

# 目录

序言 外交的知识化(文化)趋向 .....	( 1 )
-----------------------	-------

## 上篇 理 论 篇

<b>第一章 文化外交的界定 .....</b>	<b>( 23 )</b>
第一节 文化外交的含义、特点、性质与地位 .....	( 23 )
第二节 文化外交的种类、方式与途径 .....	( 27 )
第三节 文化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关系 .....	( 28 )
第四节 文化外交的理念基础 .....	( 36 )
<b>第二章 文化外交的跨文化传播基础 .....</b>	<b>( 38 )</b>
第一节 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政治性发生 ——文化外交 .....	( 38 )
第二节 政治性跨文化传播的核心目标——劝服 .....	( 42 )
第三节 政治性跨文化传播的异化物——对外宣传 .....	( 44 )
<b>第三章 文化外交的资源——文化软实力 .....</b>	<b>( 49 )</b>
第一节 文化软实力 .....	( 49 )
第二节 信息时代的文化软实力 .....	( 53 )
第三节 文化外交——文化软权力的运用 .....	( 58 )

<b>第四章 文化外交的作用——国家国际威望的树立</b> .....	(61)
第一节 国际威望的现实主义理解 .....	(62)
第二节 国际威望的建构主义理解 .....	(64)
第三节 从对外宣传到文化外交 .....	(67)

### 中篇 殷 鉴 篇

<b>第五章 美国的文化外交</b> .....	(73)
第一节 美国的文化外交战略 .....	(74)
第二节 美国文化外交战略的实施 .....	(87)
第三节 从公共外交看美国的文化外交 .....	(95)
第四节 对美国文化外交的反思 .....	(103)
<b>第六章 世界其他主要大国的文化外交</b> .....	(111)
第一节 法国的文化外交 .....	(112)
第二节 英国的文化外交 .....	(117)
第三节 加拿大的文化外交 .....	(121)
第四节 日本的文化外交 .....	(125)
第五节 苏联(俄罗斯)的文化外交 .....	(134)
第六节 德国的文化外交 .....	(137)

### 下篇 决 策 篇

<b>第七章 中国的文化外交决策</b> .....	(143)
第一节 文化外交资源探源 .....	(143)
第二节 文化外交战略的制定 .....	(149)
<b>第八章 中国文化外交战略的实施</b> .....	(156)
第一节 文化外交战略的实施——作为对外人际 传播的对外文化交流 .....	(157)
第二节 文化外交战略的实施——作为国际大众 传播的对外文化交流 .....	(166)

第三节 文化外交战略的实施——文化外交 体制的革新·····	(179)
结束语 追求文化外交的新境界·····	(187)
主要参考文献·····	(189)
后记·····	(191)

# 序言

## 外交的知识化(文化)趋向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步伐,世界正朝着文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借助先进的信息技术及发达的大众传媒,文化交往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和水平。在国际交往中,各国纷纷把注意力和重心从军事和经济领域转向文化领域,并把对外文化交流纳入到国家的整体外交事业中。这种由一国政府所从事的、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的对外文化交流行为被称之为“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sup>①</sup>。

### 一、国际政治的知识化(文化)转型

文化的载体是知识。世界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不仅是一种文化资源,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资源。知识和政治的结合形成了所谓的“政治化知识”或“知识化政治”。这种知识的权力化倾向与权力

---

<sup>①</sup> “文化外交”这一新的外交概念最早由美国外交史学家拉尔夫·特纳(Larf Turner)20世纪40年代所提出,由美国外交史专家弗兰克·宁柯维奇(Frank Ninkovich)系统阐述发展。



来源的知识化倾向<sup>①</sup>，日益深刻地影响着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生活。于是，在当前国际政治领域，发生了权力的实质性转变。对此，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提出，在支撑权力的支柱——暴力、财富与知识——之中，知识产生高质量的权力。由此，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将不再作为衡量国家实力的主要指标，知识的控制是明日世界争夺权力的焦点。谁家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谁家就是国际权力斗争的赢家。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也指出，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确实，在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步伐，知识经济的逐渐成形正日益改变着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和格局。掌握知识经济的核心——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国家对国际社会的局势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维护越来越依赖信息、知识等文化载体的保护和发展。于是，知识和文化领域成为国家行为体之间为维护本国主权而开辟的一个新的较量场所，其激烈程度与日俱增。“知识改变权力”、“文化改变(人类)命运”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正当得到最丰富而生动的体现。对此，加拿大学者谢弗在1996年第3期《未来》杂志中指出：“迄今为止，人们很少从文化的角度来考虑世界体系，这是不可思议的。世界正经历一个明显的和生气勃勃的文化变革时期，文化日益成为社区以及地区、国家和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有影响的力量。”<sup>②</sup>基于此，日本学者平野健一郎认为，“(正是文化规定了人们的生活和生活方式的形态，因此，)忽略文化因素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根本上说是不完整的”<sup>③</sup>。美国学者麦哲则预言：“文化，将成为当前研究有关国际关系、国际安全和世界经济等

① 倡导“权力话语思想”的后现代主义者福柯(M. Foucault)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知识(理性、概念、话语与文本)——(政治)权力的内在关联性：知识建构了权力(社会政治现实)，权力强化着知识。

② 谢弗：《从文化观点看新的世界体系》，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12期。

③ 转引自李廷江：《探索国际关系的新视角》，载《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问题的著作中最时髦的概念。”<sup>①</sup>

毫无疑问,在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文化因素成为了最具世界流动性的因素,也是最为深刻的世界变动因素。信息时代新的文化传播途径——互联网——穿越国界,跨越时空,最大限度地拓展了文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从而使世界所有的文化体系更为开放,使人们的文化选择更为自由。信息与文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地影响和改变着世界各国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被人称为国际关系的第三或第四维度(方面)——国际文化关系(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sup>②</sup>

本来,在信息化浪潮中,信息流动是双向的,互联网是没有中心的,但走在信息技术革命前列、国际互联网最发达的美国,每天向世界各地发送数以亿万计的信息。这些深深地打上了美国文化价值观印记的信息,以极强的冲击力和渗透力压倒、吞噬着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本土文化,影响着当地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就是美国这个“媒介帝国”制造的“信息暴政”。总的说来,世界信息传播呈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态势。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这使得来自发达国家的声音、图像、文字多,来

<sup>①</sup> 麦哲:《文化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述评》,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4期。

<sup>②</sup> “国际文化关系”(Les Relations Culturelles Internationales)术语最早是由法国文化关系政策学者路易·多洛(Louis Dollot)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文化关系》一书中提出的。他把国际文化(合作)关系的出现当成第三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是国家干预文化事业,第二次是大众传播媒介把文化财富和价值的享受面扩大为人民大众)。国际文化关系被称之为第三个方面,是相对于政治与经济(贸易)关系而言的(继政治、经济之后),以欧洲为代表的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的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倾向于持此看法。如德国的外交部前文化关系司司长迪埃特·萨特雷(Deate Sattlei)指出,文化在国际生活中排在“第三场”(在政治、经济之后)。被称之为第四个方面,作为国际关系中的第四种关系,则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贸易)和军事(国防、安全)关系而言的(继政治、经济与军事之后),美国学者一般持此看法。如美国负责教育与文化事务的前首席助理国务卿菲利普·库姆斯(Philip Coombs)认为,文化、教育事务是对外关系的“第四个方面”。

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图像、文字少。<sup>①</sup>以至于从前者发出的文化信息超出了后者的信息接受和处理能力,造成后者的“文化紧张”和“文化休克”(cultural shock),同时也对后者的文化传播主权和文化传播资源构成了威胁。<sup>②</sup>文化传播强国和文化传播弱国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状态被称之为跨文化(trans-culture)传播中的非对称(asymmetry)现象。国际信息和文化传播格局的非对称性深刻地左右着国际文化关系格局,体现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对此,日本学者大沼保昭于1998年1月5日在《东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21世纪的所谓现代化就是‘自由化’和‘民主化’,就是同国际网络联系在一起的信息化。因此,欧美、尤其是具有压倒一切的影响力的美国价值观,已超越国界并渗透到世界各地。”一句话,“在现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完全控制着世界”(德国《明镜》周刊1997年10月下旬一篇封面文章上的话)。文化的这种“跨国界行动”,尤其是不对称(对等)、不均衡的跨国流动,体现的正是文化价值观运动的总态势和趋向。这种总的运动态势构成了整个国际文化及其价值观关系格局。从全球范围审视,它呈现出的是文化的等差(不平等)格局。在全球文化等差格局中,一般而言,一个国家文化辐射力的强弱,受制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国力。经济发展水平高、综合国力强的国家,其文化辐射力就强,对世界文化的影响和贡献就大;反之则弱、则小。从世界范围看,文化的主要流向,总是从强国流向弱国。对强国来说,文化出口量要大于进口量——所谓“出多进少”,本国文化对外国的影响要

① 据统计,在美国与拉丁美洲的电视节目双向传送中,每100分钟的节目量,美国的节目占了99分钟,这样的双向传送实际上已成为单向传送了。而就全球而言,至少有3/4的消息来源于发达国家,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三大世界级通讯社基本上主宰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闻大多是转播它们的内容。还有几个数字更能说明问题:拥有使用者人数最多的语言——中文,在全世界的因特网服务器的内存中,其信息只占4%;而美国提供的一般性网上消息则占到80%,服务信息占到94%。

② 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觉悟到:“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民族弱势文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在大量西方文化的熏陶下,就会发生向西方文化的变异,有的会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见关世杰:《国际文化传播》,载《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50页。

大于外来文化对本国的影响,享有文化“贸易顺差”,居于“文化盈余”态势,体现出的是一种文化强势和攻势;而弱国相反,引进文化要素的数量大于输出文化要素的数量——所谓“进多出少”,外来文化对本国的影响要大于本国文化对外国的影响,屈居文化“贸易逆差”,陷于“文化赤字”境地,体现出的是一种文化弱势和守势。<sup>①</sup>于是,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其实是文化主权与文化霸权之间、文化控制与反控制之间)大战在所难免。<sup>②</sup>

随着冷战后政治、意识形态及军事方面的对抗作用在减弱,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碰撞、磨合的步伐不断加快,国际社会中所处的世界和生活越来越“文化化”,人们的文化意识空前高涨。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文明冲突论”,他指出,世界政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文化将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而核心的因素。“……在这个新世界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首要地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或经济上的。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性根源将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首要冲突将发生在拥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着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裂线将成为未来的交火线。”<sup>③</sup>在冷战后的未来,人们对国家的忠诚将让位于对文明(文化价值观)的信仰、认同、归属和忠诚。由此带来世界人民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和角色的改变,各国重新界定自身的国家利益,并采取相应的对外政策和行动。基于不同人民之间最根本的区分不在于意识形态、政治或经济,而在于文化,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分界线进行重组,具有相似文明的

---

① 譬如,从汉唐到17、18世纪,中国处于盛世,是世界强国,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流向是自东向西,当时,欧洲人较全面而深入地知道中国,而中国人对欧洲却不甚了解。后来,中国国力衰落,中西文化交流的流向就发生了逆转,成了自西向东,中国人开始“睁大眼睛看世界(欧洲)”,而欧洲人却对中国的事一无所知。时至今日,中国文化的弱势、守势地位仍然没有改变,这集中表现在对外文化交流的逆差上,报刊与电影、VCD和DVD等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比例分别是4:1与14:1。

②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美国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入侵和对全球文化“话语权”的垄断,包括英法在内的众多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纷纷举起了“文化反击战”的旗帜。

③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 22.

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和超级大国关系所界定的联盟,正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sup>①</sup>“在未来,文明认同(身份, civilization identity)日显重要。未来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将由七八种主要的文明(西方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之间的互动所塑造。”<sup>②</sup>未来国际政治的版图将由八大文明整合的新的文明体系取代过去由苏联、美国和第三世界三大集团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显然,亨廷顿把文化和文明看待为国际关系中的范式、支配性框架和关键变量,它成为国际事务中国家行为的最重要的基础和根据。在此,亨廷顿无疑宣告了国际政治将从硬(权力)政治或实物政治向软(权力)政治或文明政治过渡。<sup>③</sup>

如果说,在过去,商品货物的流通是最显著的全球化现象,军事对抗是最大的政治,军事力量是衡量国家实力的惟一标准,那么在政治、文化也走向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上述国际政治的含义和国家实力的标准,已经不合时宜了。在知识经济的今天,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再主要的是自然和人力资源,而更多地取决于知识和信息;国际政治上的争夺不再表现为掳人抢物、攻城略地,而更多地表现为思想的较量,为理想、信念而战;国家的安全威胁的主要来源不仅仅有国外的核军事力量,而且还有国外的政治认同和意识形态的同化;国家实现安全的目标也不再完全通过军事和经济力量(所谓的“冷兵器”)来实现,而更多的是通过合法化的政治文化及其认同来确保。在当代国际政治生活和世界事务中,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些目标,与其说是通过军事力量(威逼或强制力)、经济力量(利诱或收买力)实现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Simon and Schuster, 1996, p. 298.

②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p. 24.

③ 新自由主义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提出: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军事安全、意识形态、能源、资源、环境与人口等问题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中,军事力量的作用日趋削弱,武力作为政策工具已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也就是说,权力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的,不如说是通过对外文化力量(劝服、吸引力或同化力)达到的。一方面,军事行动经常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成本、代价和风险,远远超出该国从此种行动中得到的利益。而且,核武器的存在和扩散极大地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特别是主要国家间的战争,尽管仍然会存在一些地区性的战争;与此相比,文化是一个相对便捷而有效的权力资源,是国家间展开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利器。它被国际政治学者称为“文化力”(Cultural Forces),或者被称为“软权力”(Soft Power)。它强调的是文化、意识形态和国际机制超凡的魅力和吸引效果。拥有文化软权力资源的国家放射出影响力,它使得外部的相关行为体都受到这种辐射力的影响,以至于该国可以借此达到其对外战略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关键在于思想和文化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让对方想做你想要他做的事)所起的作用。

## 二、国家对外事务中的文化内涵

人们在看待世界政治、处理国际事务时,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他们所处的文化背景和环境。一个国家的民众往往共同分享和维系着体现他们国家文化特质的“集体(无)意识”——理想、信仰、梦幻、价值、观念、思想、记忆等。正是这些折射他们文化内核(核质)的“集体(无)意识”“范导”(规范和指导)着该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言行和态度。美国学者洛弗尔(John P. Lovell)在谈到文化对外交的影响时说:“人是在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受到其中的基本价值观、风俗习惯和信仰的熏陶……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定都是在某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sup>①</sup>麦哲也说:“文化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行动和自组运作的基本动力。”<sup>②</sup>因此,研究大国,尤其是

<sup>①</sup> John P. Lovell, “The United States as Ally and Adversary in East Asia: Reflections on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Jongsuk Chay, e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90, p. 89.

<sup>②</sup> 麦哲:《文化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述评》,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4期。

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大国的对外政策,不可不深究其文化。<sup>①</sup> 基于此,美国学者、《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一书的作者迈克尔·亨特(Michael J. Hunt)曾明确提出要“用文化分析法去研究美国外交政策”<sup>②</sup>。

作为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背景和动力的文化,对其外交决策的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政治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人的心理状态往往影响其态度和行为。人格化的国家也是如此。一国的民族文化、政治文化、国民性和国民士气往往会影响其对外政策的倾向性。文化不仅在确定和调整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中起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一国外交政策实施中的手段、方式和风格也有巨大影响。

在文化中,对外交发生最明显影响的是政治文化。亨廷顿把政治文化定义为“关于外在政治象征的信仰、价值以及社会成员对政治可能采取的其他取向”<sup>③</sup>。俄国学者卡缪斯卡娅指出:“高度稳定是成熟的政治文化规范的特点。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从社会经受长期深刻震动时期起保存下来,已存在千百年。政治文化的基本规范和价值作为人民共同的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民族同一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sup>④</sup> 美国学者杰里尔·罗赛蒂(Jerel A. Rosati)指出,政治文化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人民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及其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关的国家的关系的态度和方法”,它构筑出一个国家在世界上应发挥的作用的文化设想,具体到对外关系中,它为一国的民众观察和认识世界及其本国在世界舞台上的位置和角色提供了一种视角。政治文化“不是以立即的、直接的方式,而是通过渲染人们对自己的国家及其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的看法来影响国内政治和政策制

① 中国学者王缉思很早就提出:“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见《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载《中美关系十年》,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30页。

② 参见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③ Roland H. Elbe, Raymond Taras, James D. Cochrane, *Political Culture and Foreign Policy in Latin Americ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 7.

④ 卡缪斯卡娅:《美国的政治文化》,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年第2期。

定过程”<sup>①</sup>。同时,政治文化包含着某种核心的价值观,这种价值取向直接影响到国家在确立对外战略时对国家利益的定位。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文化价值观,比方说,美国的政治文化集中体现为民主、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因而会作出不同的国家利益选择。罗赛蒂还指出,政治文化不仅决定了各国对外政策是存在“民族风格”或“民族特色”的,而且,政治文化所蕴涵的民族主义信念的力量在对外日常交往,尤其是在危机和战争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和强大。在此,他坦率地指出:“无论在大众群体、还是精英群体中,大多数人都有某种种族中心主义世界观,从而影响到对外政策的制定。”<sup>②</sup> 在国家的对外决策过程中,政治文化不仅具有世界观定位和价值定向功能,而且具有规范功能和认同功能,它限定了国家对外政策可选择的范围。一定的政治文化价值观为对外决策提供了一套价值评判标准,它无形中规定、制约着外交政策所能自由活动的空间。也就是说,只有符合或至少不悖于国家核心的政治文化价值观的对外政策才能获得民众的认同。<sup>③</sup> 这就要求国家在对外决策过程中要做好“角色定位”和“自我认同”<sup>④</sup>。事实上,诚如建构主义者温特(Alexander Wendt)所指出的:“国家把文化作为‘大脑’中的参照框架,以此确定自己的身份、利益和思维方式。”<sup>⑤</sup>

可见,政治文化因素贯穿于国家对外战略的确立——包括对国际形势、格局和关系的判断,对国家角色、地位与目标的定位,对国家

① 杰里尔·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72页。

② 同上书,第373页。

③ 参见邢悦:《文化功能在对外政策中的表现》,载《太平洋学报》,2002年第3期。

④ 在此,建构主义是这样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解释的:文化往往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作为信仰、观念等精神性的理念形式或作为准则、习俗、惯例等制度化的规范形式,表现为对社会成员的“集体期待”。而社会成员寻求满足这种期待的过程中进行角色定位、自我认同(identity),进而获得他人的承认,完成“集体认同”。正是文化帮助人们确立起自身的身份(identity),界定出自身的利益,从而决定、“规范”着人们的态度,并潜在地对人们的行为构成约束。而且,这种“规范”和“约束”不同于一般性的制度管制,而是一种内化到人格中去的构成性影响。作为一台人格化的机器,国家是民族文化内的一部分,对外决策中的政府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着个体人一样的角色。参见李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思潮》,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7页。

⑤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5页。



利益的定向——与外交政策的制定的全过程。

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的这种外交影响力作用是深层次、潜移默化的,它首先是通过外交决策者的信仰、认识、价值观、兴趣、愿望、态度、习惯和个性等构成的“棱镜”起作用的。现实主义所认为的“一个无差别的、绝对理性的整体”的国家行为,实际上在决策过程中受到特定决策者某种预先倾向性(“前见”、“前识”, pre-conception)所影响或左右。正如伊恩·约翰斯顿在1995年所言,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战略重点,而战略重点来自该国早期的或业已形成的文化经验,并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国家或精英们的哲学、政治、文化和认识特性的影响。文化好比认识的“过滤器”,决策者看问题、作决定总是通过不同的文化“过滤”进行的。文化观念强烈地影响,乃至支配着对外决策者的决策行为;反过来,外交决策者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本国的文化观念和取向作为选择的坐标。美国国务卿“看待周围世界的眼光,会在性质上大不同于伊朗国王看待世界的眼光”,其差异“部分地来自于他们不同的个人偏好和意识形态,部分地来自他们各自扎根于几千年来不同的文化世界里”<sup>①</sup>。因此,麦哲认为,“文化透镜和信仰体系长期既个体地又集体地强烈影响着国家领导人理解政策问题的方式,通常还决定着人们对解决这类问题的方式的选择”<sup>②</sup>。美国外交史专家弗兰克·宁柯维奇(Frank Ninkovich)更明确地指出:“见识深远的政治家总是承认外交同样需要考虑文化价值观,由于这些价值观在形成外交理解力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较之意识形态信仰或抽象的理念更具意义。在20世纪,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都无一例外地把文化因素考虑为其处理外交事务的组成部分;的确,文化在他们的对外决策中起着明显的、常常是决定性的作用。”<sup>③</sup>杰出的对外决策人物之所以杰出,与其说是由他的个人魅力

<sup>①</sup> Ali A. Mazrui, *Cultural Forces in World Politics*, New Hampshire: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Inc., 1990, p. 7.

<sup>②</sup> 麦哲:《文化与国际关系:基本理论述评》,载《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4期。

<sup>③</sup> Frank Ninkovich, "Culture in U. 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00", in Jongsuk Chay, ed.,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1990, p. 103.